

唐振常文集补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振常文集补编 / 唐振常著 ; 唐明编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ISBN 978 - 7 - 5520 - 3578 - 0

I. ①唐… II. ①唐… ②唐… III. ①社会科学—文
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02513 号

唐振常文集补编

著 者: 唐振常

编 者: 唐 明

责任编辑: 杨 潇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8

字 数: 267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7 月第 1 版 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作者介绍

唐振常(一九二二~二〇〇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文章家,曾任上海、香港、天津大公报记者、编辑、采访主任,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笔会副刊部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副所长。研究范围为中国近现代史及上海史。著有《唐振常文集》(七卷)。作者在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的影响,不仅涉及中国历史学界、学术界,更是超过文化界,惠及整个中国社会。当年风行一时的“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均为作者首先提出或借用而被社会采纳。其行文风格独树一帜,被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黎澍誉为“中国难得的一支笔”。其日记、未发表文章、手稿、书信、照片等已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并向公众开放,为该所收藏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的档案。

编辑说明

二〇一二年编辑父亲文集时,出于种种原因,不少文章未予收入。承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惠允,出一补编。原已编辑完工,后发现部分所选文章并不合适,终至搁置。近期穷二月之力,打印成文,重新编辑,分为“识史”、“上海史研究”、“文化”、“学术报告座谈会及会议发言”、“地方志”、“记人”、“读书”、“香港”、“贺词”、“饮食”、“忆旧”、“其他”、“叙文”、“自序”十四篇类八十九文。这种分法,近乎勉强,很难完全避免分类的不妥(原先编辑父亲文集时,就有分类不妥之处)。另,二〇一八年编辑父亲文集补编时,曾写有后记,后发现不收为宜,故此次编辑,予以删除,谨此说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目 录

编辑说明	001
这案子翻不得	001
历史的昭示	004
岂可随意称“国贼”	005
民国军阀	008
蔡元培之大	010
为黄裳补白	013
台湾之恋	015
中日之间耻何多	017
勿忘历史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杞忧	019
抗战促进化	021
燕大无“四大名旦”之说	024
黎澍学述	027
上海历史发展的道路	
——为纪念建城七百年作	031
上海近代化的历史思索	034
租界辑略	038
上海研究断想三题	041
旧话重提	
——关于国民性改造	045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048
开展文化史研究	051
一代通人蔡元培	054
在王金发学术讨论会暨殉难七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066
从吴虞研究谈历史人物评价(提纲)	075
附 寻根究底挖史料 实事求是评人物 ——唐振常谈《吴虞研究》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学术秘书组	078
在陈英士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提纲)	082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085
改革开放本身就包含了文化问题	103
历史在前进	105
历史如此论定	106
上海城市形象的三个特点	108
继承传统,建立新方志学理论	110
上海近年修志工作回顾和建议	117
《川沙县志》初稿评议	121
《金山县志》读后	125
《宝钢志》第四稿评审意见	128
城市区志要抓住特点写出个性	132
《晋江市志》 ——富有特色之作	135
今世古人	137
从容自如一君子	139
我泪欲干哭黎澍	141
暗箭伤人	145
寿蔡尚思先生	147
此作有新意	149

工人运动史研究新成果	
——《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读后	151
访古讲史 各得其宜	155
读《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156
“疑案”读后	159
香港缘	160
高楼悄悄盖起	165
真假大减价	167
不惑之寿	169
贺上图新馆开馆	171
上海谈吃	173
菜馆佳名举隅	175
难说	177
早岁那知世事艰	179
三总督的题字	182
北大能容蔡元培否	184
道高犹许后生闻	186
吴雨僧先生百年冥诞所感	188
往事今思	190
虽有困难 并非不能	193
解放思想一题	196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198
学术的位置	200
读书自识字始	202
复钱剑夫先生	204
附 还要读点古书	钱剑夫 205
逃出昆明	206
再谈大公报的一件往事	208

沪城沧桑七百年

——《上海七百年》序 209

《上海一百年》序 212

《上海史研究》前言 214

历史与现实

——《上海史研究·二编》序 215

光荣增斗志 屈辱励雄心

——《外滩》画册序 219

《上海旧政权建置志》序 221

《上海工运志》序 223

《龙华镇志》序 225

《浦东辞典》序 227

史之用,得矣

——朱炎初朱佩明《金山古今谈》序 229

《嘉定古今》序 231

《黎澍之路》后记 233

一把辛酸写电影

——《李天济电影剧作选》序 234

时代记录 记者良心

——唐海《难忘的“号外”》序 237

《近代上海探索录》前言 241

《川上集》自序 243

《识史集》集前小引 245

《繁弦杂奏》小引 246

《半拙斋古今谈》自序 247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自序 249

《史海寻渡》自序 251

《香江论学集》自序 253

这案子翻不得

《文汇读书周报》第三六〇号摘载一文，题曰《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文末写道：“于是，刘大杰就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中，提出了‘韩愈并不是醇儒’的看法，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一片臭骂韩愈、扬柳抑韩的声浪中，也算是有点儿突破、不很容易的事了。”着墨不多，用词似乎也很谨慎，突破的程度只是“一点儿”，做此事也只是“不很容易”。但是，凡读过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七六年修订本并略知此书在评法批儒中所起赫赫作用的人，都知道刘先生“臭骂韩愈”最烈，在“扬柳抑韩的声浪中”调门最高，因而也就明了这个“一点儿”、“不很容易”的分量之重。一部以儒法斗争贯穿全书的作品，一部把自己一九五八年原作的论点颠倒过来的作品，也就是说，一部全然不顾历史事实的作品，变成了坚持历史、敢于逆风而作的作品了。

我在一九七八年写过《可怜无补费精神——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关于韩柳的评价》一篇长文，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可以复按，在此勿烦具揭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对于韩愈所作的违反历史的评论，这种旧账原可不必再算。刘大杰先生是一位学者，历史已予评论。刘大杰先生又是一位文人，我不愿意引用顾炎武的“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论”这句话。评法批儒之时，虽不能说举世滔滔，毕竟搅得一片混乱，当时耐不住寂寞，以后其事澄清，其情未始不可原。刘先生作古多年，其事寢矣。所可虑者，后人不明当时之究竟，或作本末之颠倒。为此，不得不有所言。

诚然，《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有韩愈非醇儒之说。其说非创自刘大杰先生，《旧唐书》作者刘昫等人早见及此，该书《韩愈传》说：“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齷孔孟之旨。”王船山谓：“王通之所以不得为真儒也。况杨

雄、韩愈之利欲熏心者乎？”（《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自然离“真儒”更远了。至于理学家程朱斥韩愈非醇儒的话就更多了。韩愈身上，儒墨法思想兼而有之，以儒为主。这在古代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足为异。柳宗元亦何尝不如是，柳比韩只是易墨为佛，他自称志在“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来个一刀切，是不可能的。刘先生在从根本上痛斥韩愈之余，说几句韩愈非醇儒的话，又何足异。出乎刘先生原意的是，如此一来，却反证了儒法斗争说之不通。

试看刘先生评论韩愈非醇儒所举例证，共六条（也都是上举这篇文章所曾举出的），一半是说韩愈赞扬了法家，一半是指韩愈亦有“离经叛道”之处。（一）韩愈《进士策问十三首》之第五问，举管仲、商鞅之功，发一问：“而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愿与诸生论之，无惑于旧说。”刘先生以是评论说，“其（按指韩愈此文）称赞法家和其针对当时政治的现实意义，十分清楚。”（二）韩愈有《读鹞冠子》一篇，对这部“杂黄老刑名”之作加以赞扬。刘先生引论说：“这和他推崇管仲、商鞅的精神是一致的。”可是，扬柳抑韩、尊法反儒的刘先生却忘了，柳宗元有一篇《辩鹞冠子》，说是“读之，尽鄙浅言也”，完全不提，一提不就不能加柳宗元以法家的帽子吗？（三）称赞韩愈的《后汉三贤赞》赞扬了“王充、王符、仲长统这三位富于法家思想倾向的人物”。于是，刘先生下结论说：“从上面三点来看，在他的思想中确实有一定的同情法家的倾向。”那么，可见儒法并不是总斗争的。

以下还有三个例证，一、举韩愈《读墨子》之不赞成孟轲辟墨，二、举韩愈名文《讳辩》，“从上面的两点看，说明他在儒家内部确有‘离经叛道’的地方”。这是众人所知之事，不得不尔。最后一个例证，举韩愈的《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谓与“儒学背道而驰”。谈韩愈此二作，尤其《毛颖传》，必与唐代传奇的兴起，古文运动的丰功伟业相联系，刘先生对韩作《毛颖传》，只是从柳宗元加以赞扬这个角度去评价，对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和卓然功绩，则一反他自己一九五八年的评价。抹煞、颠倒，甚而创造了古文运动中的保守派这个无中生有之词加于韩愈之身，以与其所谓革新派的柳宗元相对立。这就完全荒谬了。韩愈为古文运动的倡行者，柳宗元与之并肩战斗，韩柳于此，纯然相倚，绝无所谓对立。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古文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韩愈既为古文运动之不易领袖，复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为传奇开先导，其作较之此后盛行的传

奇,甚至同时而稍后的《莺莺传》、《长恨歌传》,虽相差远甚,然登高一呼,身体力行,其功不可磨灭。唐人行卷、温卷,多以所作传奇之类投献,其原因如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记,“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韩愈以古文大家,诗才、史笔、议论均所擅场,倡之为文,影响所及,不可估量。陈寅恪先生于此所见最深,是以先生论古文运动与传奇关系及韩愈之所以为领袖最切。刘先生见不及此,且不论,谬为儒法斗争之说,力贬韩愈,不能不说是违心之论了。学者刘先生何以出此,我们不必推究所以。旧文《可怜无补费精神》的结束语于此曾有论述,不赘。

上述文章还说,刘先生在动笔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之前,曾写一信给毛泽东主席,提出韩愈非醇儒之理,毛复信赞同。我在一九七八年写评《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之时,曾有好心的朋友提醒,说毛有一信,对刘书有评。为免越“凡是”之范围,我请人查阅原信,得回复说,不过寥寥数语,未涉具体观点。此文记载毛对刘谈古典文学事,对读者有益。然文末带出旧事,以为揄扬,则是本末之倒置。这个案子是翻不得的。

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想到一事,不免赘语数句。多年以来,人们常引“君王圣明,臣罪当诛”句以斥责韩愈,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错责。我在《可怜无补费精神》文中,已揭载其事,近来还见时文中如此说。韩愈其人其思想,自有可批评处,但这句话却不可评。韩诗此句见于《拘幽操·文王羑里作》,文王拘于羑里,愤而作《幽拘操》,原诗为:“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动勤兮。”明显地怨殷政,怨纣王,诉自己无罪。韩愈感其事仿其意而作《拘幽操》,并明标《文王羑里作》为副题,诗意与文王操琴之辞相似,而更为尖锐、深刻和形象化。韩诗曰:“目窈窕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那么明显的攻击时事之混乱颠倒和纣王之无道。“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明显的是微词,是反语,是极愤怒的咒骂,又是艺术性的语言,断章取义地以此斥责韩愈甘当奴才,不亦谬乎!读书不求解,与不读书而人云亦云,同不可取。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原载《读书》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历史的昭示

鸦片战争是不该忘记的。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爱国精神值得纪念，帝国主义所加给中国人民的屈辱也不该忘记。一正一反，合而为百年的中国近代革命史。

从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帝国腐朽式微的本质彻底暴露，帝国主义看穿了这一点，乘其侵略本性，相继入侵，瓜分豆剖，不遗余力，终而至于八国联军直入京畿。中国人民不为所屈，反抗斗争的浪潮逐级而高。

这是事情的一面。

另一面，光有爱国的热情，光有斗争的英勇，不足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毕竟不是其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对手。从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开始，先进的知识分子相率而了解西方，了解世界。这一了解，才发现中国并非就是历史所称的天下，并非是居天下之中，也并非中国之外就是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所谓夷人的文化有些要比天朝文化高明得多，“夷夏大防”，逐渐冲垮，相率而学西方。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其所了解，由幼稚可笑而渐及实质；在这个过程中，和顽固保守派的斗争，更是曲折迂回，与前进过程相始终。体用之争，本末之辩，人们的认识，毕竟在向前进。六君子的鲜血，康梁远适异国，大批维新志士的被黜逐，反而教育了更多的人，咸与维新，乃成一时之尚。以“夷”变夏，势不可免。

资产阶级革命一举而兴，不旋踵间，又复夭折，中国积弱如故，受帝国主义之欺侮如故。爱国，反帝，反军阀，反国民党统治，这一系列的过程，与中国人民探索真理相并进。尽管此后的道路也并不平坦，而历经坎坷，中国人民信心不灭，壮志未泯，爱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大道上前进，实现四化，我们必抵于成。一百五十年的历程，昭示了我们这一条。

（原载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新民晚报》）

岂可随意称“国贼”

今年是戊戌百年纪念。戊戌维新是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努力，因政变发生而失败了，丢失了一次大好的机会，长令后之读史者兴叹。报载，二十集电视剧《戊戌风云》拍成，将在九月份播映。报道说，“与近年来泛滥银屏的‘细说清宫戏’不同，《戊》片的创作思路较严肃，专家评说具有‘史诗的风格’。”姑且无论戏还没有演出已作评论，这是近年常有的宣传手法，不足深责，只要这部片子真是思路严肃，不糟蹋历史，也就可以原谅，可以看成是对戊戌的纪念。下面有这么一句话：“李鸿章是国贼，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国臣。”看来在指明李鸿章的两面性，但调子定在国贼上，真是惊人之论。

这篇报道是在介绍《戊戌风云》，所谓国贼，自然是这部电视剧对李鸿章的基本评价。尽管李鸿章与戊戌变法和政变都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他对政变未必赞成。政变发生之初，张元济去贤良寺谒见李鸿章，说是“设将变法之事遽行停罢，甚或对皇上别有举动，恐非社稷之福。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剖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李鸿章叹气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以李鸿章这样一个年高重臣，自然不会对张元济这个后生吐其真心，张元济回忆里写的“叹气”、“小孩子懂得什么！”乃是无言之言，大大值得电影电视的编导玩味。及后政变大作，李鸿章派亲信于式枚去慰问因参与维新被革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问今后打算。张以回上海谋生答。几天后，于式枚又访张元济，说是“中堂已告知盛宣怀，去沪后将由盛安排工作。”以后果然如此。张元济乃得进入南洋公学，主持译学馆，并引进蔡元培为特班教习，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材，而张元济此后乃与商务印书馆发生关系，为中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李鸿章这一段经历，自是为国家保护了人材，仅举张元济这一个例子，已足证明。李鸿章倡洋务，就是为了革新，他虽不预戊戌维新运动，亦可想见在戊戌

维新中，他不是顽固守旧人士，政变亦非李所赞成。保护张元济，固有其因。我不知《戊戌风云》电视剧编者之所谓李“也是国臣”之论，是否指发生在李鸿章身上的上举这一类事。

然此对李鸿章而言，是微乎其微的事。论定李鸿章为国贼，则大谬特谬，非历史评价所应有。评价历史人物，最根本最重要一条，是要纳入历史条件之中，而不能脱离当时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事件之所经，此陈寅恪先生所昭示“在历史中求史识”之至言也。不这样去做，必失之偏颇。再一条，就是论此人的全面，而不忽其局部。全面者，须考察此人一生之所为；局部者，也要顾及他的一时一事。

以此看李鸿章，并不复杂到难以论定。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平捻，乃李鸿章早期的武功，这只要看太平天国和捻军对国家社会造成的混乱动荡便可论定。李鸿章最为时人訾议的事，一是倡行洋务运动，一是甲午之败。洋务运动正名应为自强运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引进西学，是革新，是改良。反对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的，皆顽固守旧之士，只有郭嵩焘这样少数的有远见的人，批评洋务运动专图功利，只求机械之制造，只得西学之末而未得其本，是有识之见。洋务运动因甲午惨败而宣告破产，这并不能证明洋务运动的改革是错了，其间有复杂的原因。而甲午之败更不能归罪于李鸿章。李鸿章主持军事三十年，北洋海军为他一手所建立，他深知当时中国不足言战，所以他反战。当时朝野轻易言战，特别是以李鸿藻为首的一帮清流，本是局外人，侈说局内事，鼓动战争，造成舆论。战前已有“李二先生是汉奸”的流言，李鸿章毕竟也爱惜名节，被迫而战，招来惨败。所以陈宝箴批评李鸿章的错乃在不当战而战，“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也。”一番议论，讲得通明透澈极矣。

世人不察，以汉奸、卖国贼喻李鸿章者多有。甲午败前，已有人比李鸿章为贾似道、严嵩，太史袁爽秋竟因此而撕毁与李鸿章嗣子经方的儿女婚约，人言可畏，斯亦其然。时至今天，所谓“非戏说的”历史电视剧仍加李以国贼之名，令人莫解。

国贼者国之贼也。五四运动时，有“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响亮口号，国贼者曹章陆三卖国附日之人也。汪精卫是国贼，他是卖国投敌的大

汉奸。此二者，皆名实相符，为不易之称。抗日战争时期，间有文章，隐指蒋介石为独夫民贼，那只是为反蒋而加的诛语，并不就符实际。谓李鸿章为国贼，名实不符，歪曲了历史。应该读一点历史，无论对什么人皆然，而于编写历史剧的人，更是必要。

一九九八年九月

（原载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文学报》）

民国军阀

《清史稿·疆臣年表》记曰：“一方治乱，岳伯尸之。清制，疆帅之重，几埒宰辅。”此说得实情。其实，岂只清朝如此，疆吏权重，甚至不听中央指挥，由来久矣。最突出最典型的还不是清朝，而是唐朝的藩镇。中唐以后，藩镇如同割据，中枢完全不能指挥，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其间，自然还掺杂了一个民族因素，自安禄山始，唐代藩镇多为胡人，或胡化的汉人，更加不受中央节制。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不只是在文体上的反对骈俪之文，在政治上更有反藩镇割据的意义，所以它的中心思想是尊王攘夷。于此，先师陈寅恪先生有极精辟的一系列论证，为治唐史者所熟知。

清朝愈是到晚期，疆吏愈是权重，而往往有不听中央号令之事。疆吏既拥兵权，便有了资本独行其是。太平天国事起，从曾国藩以丁忧在乡之身练湘勇以自重，继之，李鸿章练淮勇，左宗棠练楚勇，后相继为督抚大员，更拥兵以自重，所谓撤勇，往往只是应付中央的表面文章。曾左李为总督时，都有不奉令的事。最为突出的是，义和团事起，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竟倡东南互保条约，如同表示在这场战争中居于中立，连与东南一地关系较少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亦从而加入之。这对于支持义和团的清中央政府，是多么难堪的行为。及为八国联军所败，李鸿章奉命赴北京签约，抵上海后，滞留数月，迟迟不肯行。这在从前，是违抗圣命的大忤逆之举，而清廷无如之何。

如谓清朝疆吏所为已有民国军阀的某些先兆，民国军阀不过是在中央无从号令的新形势下的产物，其来有源，当不为过。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殆无疑义。但是，对军阀个人，则不可一概而论。军阀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亦有，知书识礼，这样的军阀，就不会如同强盗。军阀为了保证他的防区（地盘）能稳固，保证和旁的军阀在竞争中能操胜算，除了扩充军权，还要兴文事，办实业，创教育，并非全是武化统

治。吴佩孚是秀才出身，有文化，能打仗，重知识。韩复榘也重文化，他可以把梁漱溟请到山东办乡村教育，还创办一个负盛名的青岛大学，一时人才济济，杨振声长校，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余上沅等均来任教。占据重庆的军阀可以请共产党人萧楚女、恽代英执教重庆。一个后来最拥蒋反共的四川军阀杨森，懂得在他的防区内开启民智，兴办民众教育，全力支持卢作孚办民生公司。军阀结交学者文人，就说他是为了要誉，也总是好事。此类例证甚多，我所身经，一九四四年，我参加成都记者团访问乐山，警备司令某邀请座谈，陪者皆时在乐山武汉大学的名教授朱光潜、杨人梗等。

云南军阀一向较为稳定，从唐继尧到龙云，势力不衰。方当倡联省自治之时，主此议最力者为章太炎，章所寄希望最大者为唐继尧。滇军出了个讨袁首发的蔡锷，还出了个共产党领导人朱德。云南讲武堂培养的人，并不亚于保定军官学校。如此等等，非为军阀评功，只不过说明对军阀也要作分析，并从历史考军阀之源而已。

（原载一九九五年一月十日《香港商报》）